

应为“高管集体辞职”预设政策阀门

江金祺

7月11日,全聚德公告称,该公司董事长王志强、总经理邢颖、董事会秘书施炳丰、董事张冬梅“因工作变动”请辞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会董事职位。4人之中,前3人为全聚德的“三巨头”。“三巨头”的任期本来应到2018年才结束,为何要提前两年集体辞职?公告未说明,公众当然也就无从知晓。

集体辞职年年有,今年细数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以来,有包括酒鬼酒、九芝堂、深信泰丰、安泰集团等14家上市公司高管集体辞职。

通过对以上案例梳理发现,关于集体辞职的原因,所有公告给出的理由都是三言两语:如全聚德给出的原因是“因工作变动”;科融环境公告称董事裴万柱、陈刚、华立新辞职是“个人工作原因”;深信泰丰和酒鬼酒高管团队的集体辞职是因为“新的高管团队入驻”;宝塔实业董事会4名高管集体辞职是因为“业绩大幅下滑”;安泰集团董事长李猛等全体7名董事集体请辞是因为公司涉嫌“信披违法”。

因为是上市公司,所以高管的集体辞职,从其震动效应来看,堪比重大重组事项。然而,全聚德等上市公

核心提示

就上市公司频发的“高管集体辞职”问题,应通过政策预设,避免高管集体辞职以及由此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冲击。如果人事震动不可避免,则应主动说明因果关系并及时就此给出评估报告。

司对此做出的解释可谓轻描淡写。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的董事、1/3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照上述规定,包括全聚德在内,对高管“集体辞职”的公告,对其中原原因仅做高度概括、精炼表达,而对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则几乎不着笔墨。

众所周知,公众投资、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买的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就是看好公司业务的未来发展。但当公司出现重大变动时,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无疑增加了投资决策的难度和风险。

“集体辞职”后的消极信披,全聚德不会是最后一案,对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以往多个案例证明,高管离职可能是与“套现”有关,也可能是高管们对本公

司未来发展或股票行情缺乏信心。从今年发生的各上市公司的公告中看,虽然各高管的辞职原因普遍集中于人事调动、个人因素、工作需要等“合理借口”,但投资者对此类解释似乎并不买账。

公众质疑的理由,除了认为“扎堆儿”辞职有诡异般的巧合,多数是对辞职者的套现冲动不无担心。董事长也罢,总经理也罢,相较于他们数额有限的年薪,套现所带来的一夜暴富,对辞职者们的吸引力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一边是投资者们犹疑不止,另一边是高管们辞职不断,这必然要求监管者需要更多地从制度层面思考。

从目前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来看,在职公司高管套现并非易事。然而,高管一旦辞职,半年后即可不受相关“门槛”制约。

此前,有多位学者对“高管辞职套现”的问题提出建议,表示应当在《公司法》中做出补充规定,“禁止公司董

事、监事、总裁和董事长等高管在辞职套现后5年内到任何上市公司就职,同时禁止他们在3年内到非上市公司就职”。除此之外,亦有业内人士建议,可规定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1年内,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得转让”,以此加大高管辞职套现成本。

由此可见,加大高管辞职套现的风险和成本,是遏制“高管集体辞职”的核心思路,当然,这一做法也有利于冲减高管们临阵“摆挑子”的冲动。毕竟,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以及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对于公司的情况最为熟知,因此也最容易从中投机、受益。

高管们可以任性,中小投资者往往就成为信息不对称的最终受害者。因此,就上市公司频发的“高管集体辞职”问题,应通过政策预设,避免高管集体辞职以及由此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冲击。如果人事震动不可避免,则应主动说明因果关系并及时就此给出评估报告。

他与国内八大彩管生产企业签订合同,以先付货款的方式,“买断”了国内所有的彩色显像管。按理说,这绝对是一个可以致其他彩电企业于死地的狠招。没想到,其他彩电企业却买通彩管厂,把长虹付了钱却一时用不上、只能存在彩管厂的彩管悄悄买走;同时还以长虹垄断彩管为由,把倪润峰告上电子工业部,争取到更多的彩管进口指标。“买断”彩管的失败,让长虹大伤元气,长虹由此告别了“中国彩电大王”的宝座。

每个人都渴望着成功,也愿意用更快捷的方式成功,重复原来的路径,就变成一个魔咒。但很少有人想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命运已经在你曾经走过的路上挖下了陷阱。在走自己所熟悉的路时,人们往往是最自信、最放松、最没有防范的,危险往往就隐藏在这里。

所有的成功都有幸运的成分,所有的不成功都与运气无关。真正遇到“天灾”或“不可抗力”的时候很少,导致失败的大多数原因是谋划不到位或控制能力不足。那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说法,只是人类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已。

非但撞大运型的成功不可重复,就是一些经典的成功经验,也往往因为时间、地点、条件、环境等某一要素的改变,而不可重复。包括很多伟大的人物,都是跌倒在自己最成功的地方。

长虹原董事长倪润峰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企业家。在他的领导下,长虹发动了一直到现在还被家电企业普遍运用的“价格战”,并一举击败了洋彩电,打赢了中国家电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仗。长虹也就此成为中国的“彩电大王”。

“买断”全球工程塑料,是一个让倪润峰本人也非常自得的传奇故事。那个晚上,正在收看《新闻联播》的倪润峰,看到海湾战争打响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石油涨价会推动石油产品涨价,制作电视机外壳的工程塑料也必然会涨价。他立刻抄起电话,通知相关部门马上下订单,买下全球范围内所有能够买到的工程塑料。这个及时的决策,让长虹意外地大赚了一笔。

1999年,彩电业的“价格战”打到白热化的程度。作为中国彩电业“霸主”的倪润峰,又想到了“买断”这一绝

不如不成功;高估自己的能力,还不如没有能力。

碰巧成功的可怕之处在于会让人的心态发生改变。守株待兔的故事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如果不是碰巧捡到一只撞到树上兔子,那个农夫还会安安稳稳地种田为生,绝不会把捡兔子作为自己“事业”和收入来源。意外捡到一只兔子本来是“飞来横财”,但由于心态变了,结果就变成了“飞来的横祸”。

像前面讲的那个实习生一样,碰巧的成功往往会让人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认识到能力的不足,踏踏实实干一样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坚持下去,也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但高估自己的能力,急躁冒进,很有可能一败涂地。

马谡是文学作品中高估自己能力的典型,在争取到守卫街亭的任务后,非但没能像其想象的那样建功立业,反而是搭上了卿卿性命。

现实中更多的人是在偶然的成功后,把一件本来是撞大运成功的事情,误认为是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然后就信心爆棚,去干和自己能力不匹配的事,结果造成惨痛损失。

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前提,应当是人才配置的市场化改革。

和少数精英群体可以通过市场化流动获得更高的收入、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不同,大部分人工资本身的自我价值不同,大部分人工资本身的提高还依赖和取决于国家和企业的财力水平。尽管目前中国从经济总量上看,已经是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在全球191个经济体中,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仅排在第76位。这个排名表明,中国目前还并不富裕,由经济总量全球第二所带来的富裕感,存在一定的虚幻性。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没有财力为劳动者发放更高的工资,期望工资水平每年都能以超过GDP的速度增长是不现实的。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和对比,中国企业员工的工资并不很低,相反可能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人本论

“碰巧的成功”不可复制

丁是钉

在一个大部分人都考了满分的考试中得了100分,能算是学习成绩好吗?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但可笑的是,当这种事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还真会有相当多的人会认为自己水平很不错。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上一轮股市狂涨的时候,某单位来了一个实习生,经济和法律双学士,父亲是地方上一个知名企业的负责人,家境也很好,手里有比较多的“零花钱”。

看着身边不少人都在炒股赚钱,这个女孩觉得自己是学经济的,对股市股票比别人应当更懂一点,就开始拿自己的“零花钱”炒股。没想到,刚一入市就开始赚钱,于是家里把所有的“闲钱”都拿出来交给女孩炒股。哪知道股市很快就由此前的狂涨变成暴跌,女孩手里的钱不停地缩水,多年积攒的辛苦钱就这么打了水漂儿。

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个案,但是类似的事情在现实中多有发生,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偶然的成功当成自己的能力,结果是失败埋下了伏笔,造成了后来巨大的损失。碰巧的成功,还

(上接第一版)

不过,需要强调是,医生、老师的“灰色收入”和官员的贪腐收入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多数情况下,红包的多少与医生或老师的水平有关,是其靠自身的能力挣来的。官员的黑色收入则是靠出卖权力、靠其所拥有的公共物品配置权获得的。这一本质性的区别必须得以明确。由于反腐和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由权力所带来的隐性收入和黑色收入急速缩减。这样一来,“当官”变得不再划算,官员离职下海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法官、税务官更是成为辞官从商较配置权获得的。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市场对于分配收入有着强大的调节能力。只要没有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只要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性制度性壁垒,实现人力资源的完全市场化流动,收入分配就会自发趋向于合理。因

观察



中国央行为何不宜推行负利率政策?

邱泉

自2009年瑞典央行正式实行负利率以来,到2014年负利率政策已提上了各国央行议程。最近,各国央行就是否实行负利率产生了广泛讨论,其结果莫衷一是,争议颇多:有人认为负利率有助于缓解银行信贷收缩、抵御通缩风险和稳定汇率;也有人认为负利率给金融市场尤其是银行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不利于金融稳定。

而从目前看,实行负利率国家的目的和成效各有区别,如西欧的丹麦和瑞士实施负利率的目标是稳定汇率;欧央行和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则是为了刺激银行积极放贷,缓解国内通缩压力。且这些实行负利率国家中,有的在刺激信贷、消费和就业及走出经济低迷状态方面,的确起到一定作用;有的效果却并不明显。因此,对是否实行负利率存在争议,相当正常。

所谓负利率政策,是指央行对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及超额准备金实行负利率政策,并不是说银行对普通储户会收取利息费用。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经济状态决定央行不宜推行负利率政策,其理由有两方面:

第一,负利率政策理论共识与我国金融经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决定我国不宜盲目实施。一般认为低利率通过对银行持有现金的惩罚,鼓励银行放贷,可以刺激企业及个人借贷,促进消费与投资,进而刺激经济。但目前,负利率理论不仅不适用于中国,且与中国客观经济现实相反。众所周知,决定信贷增长要取决于银行放贷意愿、企业或客户有效信贷需求及投资收益等三方面因素,而目前我国在这三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银行信贷投放也是一路高歌猛进。从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看,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49.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8%;6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06.69万亿元,同比增长13.0%;6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01.49万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9个百分点。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7.53万亿元,同比多增9671亿元。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47.94万亿元,同比增长12.3%。这些数据说明,金融业为稳增长在信贷投放上已发挥到了极致。但随着目前世界经济颓势及中国经济继续位于下行区间,想通过负利率刺激银行信贷的打算或难以实现,因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不景气,银行对其放贷意愿不强;且企业投资回报低,贷款意愿也呈下降趋势,导致有效信贷需求严重不足。同时,因为投资回报过低,民间投资意愿也降到了近年来冰点,都引起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和极大担忧。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没有实质性回暖,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反弹,银行盈利水平已从前几年的两位数降到现实的个位数甚至是负数,商业银行既要考虑收益覆盖成本,更要防范信贷风险,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在这样的一种经济金融状态下,若对商业银行实行负利率,意图“迫使”商业银行继续加大信贷投放,不仅不现实,且只会把商业银行逼进经营死胡同,加剧潜在金融危机。因为,在当前存款利率即将全面市场化语境下,银行在存款上拥有强势定价权的优势正在丧失,且央行本身存款基准利率较低,存贷款利率差不断缩小;加之盈利能力下降,如果商业银行无法将负利率转嫁给存款人,那么就会通过调整资产负债表结构、减少短期储蓄,增加长期投资来消化。而要覆盖向央行支付的利息,商业银行又可能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转嫁成本,也有可能去配置高风险、高收益的中长期信贷资产或将资金投入泡沫虚拟经济产业领域来弥补被侵蚀的利润,增加投资资本的套利行为;而在当前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这样反而会使我国银行经营业绩更加恶化,不利于金融稳定。

第二,央行负利率会产生外溢效应,导致居民财富缩水,更不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虽然负利率只限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不直接涉及企事业单位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但由央行负利率诱发的外溢效应完全有可能产生,如果这样会带来严重金融经济后果:

一方面会降低银行吸收存款的积极性,加之我国金融投资渠道狭窄,会迫使大量居民将资金参与到民间非法高利借贷或非法集资活动,诱发金融风险。因为,商业银行在信贷投放意愿不强而又找不到好的资产配置方式情况下,吸引社会存款越多,存放央行存款越多,亏损就越大,久而久之会失去往日吸储热情和劲头,丧失对居民储蓄存款动力。

另一方面,负利率又会助使商业银行倒逼央行进一步降低居民储蓄存款基准利率,甚至有可能对居民实行负利率。如果出现这种结局,不仅会侵蚀存款人财富,使占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财富遭遇缩水之虞,更会加大社会财富“马太效应”,使中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财富的缩减有可能导致居民消费需求下降,影响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会抵消负利率政策扩大总需求的初衷。此外,不利于存款创造和实体经济融资。因为一旦居民存款也实施负利率,居民会大量持有现金,导致货币乘数下降,进一步削弱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功能,又反过来削弱银行信贷扩张功能。